

# “士绅”文化的现代变迁 与叶氏文学世家的形成

赵普光

**内容提要** 从叶圣陶开始,经由叶至善、叶至诚,到叶兆言等,叶氏几代前后相继,形成苏州现代乡贤谱系中的一支,也成为了现代文学世家的独特存在。明末清初由徽地迁徙到姑苏的叶氏家族,晚清以来百余年的演变发展,与士绅文化的现代转型变迁有着互动的关系,既意味着传统文化基因的滋养,更表征着新的文化质素的成长,亦体现出士绅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流动,更可窥见近代以来中国世风和文风递嬗的侧面,对当代文化重建亦不无启示意义。

**关键词** “士绅”文化 现代乡贤 叶圣陶 文学世家

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南京大学博士后 210093

文化家族的变迁与士绅阶层的变化存在密切的互动互渗关系。明清之际,尽管士绅阶层还延续着传统的形态,但由于易代之际的巨大社会动荡,文化阶层分化已经开始了新趋向,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显示出新的解构与结构的端倪。此间,叶氏家族自徽地迁徙到姑苏。在清末社会的震荡过程中,叶氏家族到了叶钟济这一代由商贾转向了基层文化人士。随着废科举、兴学堂,叶圣陶从新式学堂毕业又入中小学堂任教。在民国的文化和政治转型中,作为基层的文化精英人士,中小学教员接续了已经衰落的士绅阶层,在官民之间发挥着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近现代传媒社会的风云际会中,叶圣陶最终又从一个近似于新士绅的基层文化精英转变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一转变折射出近代社会的文化分层和流动的侧面。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叶圣陶对于叶至善、叶至诚等的文化熏育,为文学世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至叶兆言,其对于某种文体风格的坚持,既是对叶氏文学世家的延续发扬,也是对此前文化传统的追怀与返顾。本文以叶圣陶为论述核心,上溯叶家的迁徙过程和叶钟济一代的文化选择,下延叶至诚、叶兆言的文脉传承,从而在近代以来文化分层的视野中探讨士绅文化的现代转型与叶氏文学世家的开端、形成过程之间的关系。

本文为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工程项目“斯文的回响:苏州叶氏文学世家评传”阶段性成果。

要论士绅文化转型、社会文化分层变迁与叶氏文学世家的开端、形成的关系,首先得谈及叶氏家族的形成,而这就必须从叶氏家族的迁徙说起。要说叶家的迁徙,还不得不从文化的迁移流动谈起。

文化即人化。在一定意义上,家族的迁徙过程,是文化流动的过程。而文化正是在流动变迁中传承的。孔子曾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第九》)孔子所言的文,乃是从周文王以来的包括礼乐制度典章等在内的文化传统。宋代朱熹曾解释:“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论语集注》卷九)这种文化传统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地从本义上衍生发出相关的意涵,如文学、人文、儒士、文雅等。不管如何衍生,大致都不离一个核心:文化的积淀而形成的传统,以及这种文化传统在人、物、文等具体层面上所浸润恣漫的精神气质。

文化的流动具有方向性。从规模、底蕴及层次上看,南宋之前,中国斯文传统主要汇聚于中原地区。在耕种为业的乡土文明时期,一马平川、气候四季分明的中原地区是最合适农业经济发展和人居的地域,文化自然也高度繁荣。斯文,本是节制人性之恶的,但终在金戈铁马面前显示出无力的一面。曾经文化最繁荣的中原地区,也无法避免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遭受战争蹂躏破坏最严重的地方。随着中原战乱不断,文化逐渐南迁。“特别是东汉以降,江东儒学士族的迅速成长,主要得益于北方人士的南徙,其中有的还是规模较大的家族式迁移。”<sup>[1]</sup>史书曾对汉代的历史文化名族的迁徙多有记载。吴郡著名的“四姓”陆、朱、张、顾中,除了顾氏为土著士族,其他三姓均是从中土南徙而来的。晋永嘉之乱也造成文化的南迁。唐长孺曾说:“永嘉乱后,大批名士南渡,本来盛行于京洛的玄学和一些新的理论,从此随着这些渡江名士传播到江南。”<sup>[2]</sup>特别是到了北宋南渡之后,大批中原士族南迁江左与临安,“西湖歌舞”中体现出原来的中原精英和正统文化开始在江南真正扎下根来。中国文化传统中最核心的部分,在以宁、苏、杭为重心的江南地域蔚然巍然。宋吴孝宗《余干县学记》曾云:“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天下。”<sup>[3]</sup>纵观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变迁,我们不妨说,这种“郁郁乎文”,从文王所在的西岐周地走来,为齐鲁之地的孔子集为大成,在唐宋王朝辉煌的中原历经二程、朱子的熔铸会通,再渡过长江,翩然驻足于江南。

这种繁荣局面的肇始,最初是由于动乱与战争而使得中土文化被动迁入,在形成文化高地之后,又会对周边地区和人口产生强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明清以来,江南文化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吸附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有清以降,从安徽、山东等区域不断有新的移民士族迁入,这又会带来新的文化汇聚和增生。有学者曾说:“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这一地区高移民的人口结构和士商阶层的相互渗透。江南许多著名的文化世族都是来自于外地(尤以徽州居多)的商人之家。他们进入江南之后,其社会角色也大多发生了变化。”<sup>[4]</sup>

在众多迁入吴地的移民中,徽人居多。“徽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

[1]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2]唐长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

[3]见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五《饶州风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4]徐茂明等:《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页。

于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sup>[1]</sup>徽商外出经商有案可稽的记录始于西晋。宋朝南迁,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客观上给了徽商一个向东走出大山的绝佳机会。近世以来的家族迁徙,比较大规模的移民发生在明末清初。在这个由安徽到江左吴地迁徙的潮流中,除了原本在徽州就已经成功经营的大家族外,更多地还是具有吃苦耐劳品格,善于经营的小户商人,到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吴地寻找更多的机会。历史是势利和无情的。在滚滚的历史河流中,绝大多数的参与者只能成为路人甲,时人或后人记录历史的镜头,几乎不会在这些路人甲脸上停留哪怕一秒钟。然而,事实上,每一次历史潮流的涌动,都是由无数个路人甲的点滴行动汇成。笔者更愿意用有情的镜头返回到历史现场,聚焦于普普通通名不见经传的人物身上。

## 二

在这个迁徙的大潮中,有一户叶姓人家,从安徽辗转流落到苏州。叶家最初落脚在城西南著名的盘门,做猪行和丝绸生意。盘门又称“蟠门”,春秋时期吴国“阖闾大城”的“路八门、水八门”之一。其地水路并联,是交通要道,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因为能够吃苦,善于经营,生意日渐扩大,叶家竟然在盘门的一条街上买下了很多店面,一时被当地人称为“叶半街”。明末的兵荒马乱,迫使叶家来到他乡,竟不期然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但是在后来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乱中,叶家还是没有能够躲过。在叶家的儿子叶钟济刚刚十二岁的那年,也就是1860年,李秀成攻打苏州。太平军攻克苏州后,采取了严密的控制,封锁了大运河,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这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败。当然,商业也被摧毁。正是在这场战乱中,叶家难逃厄运。

失去了往日辉煌的叶家,后来移居到苏州城内的悬桥巷。叶钟济渐渐长大成人,为当地一位吴姓人家作“知数”,也就是账房先生,管理田租。尽管叶圣陶后来回忆说,“我家无半亩田一间屋”,“家境很清苦”<sup>[2]</sup>,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叶钟济在彼时、彼地是有知识的人,所以做了账房。那么,作为当时掌握了一定知识的人,其身份已经比一般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的地位要高。据后来的记录,叶钟济“深得邻里的钦敬。一些大户人家逢到婚嫁庆吊,也请他去临时料理账务。”<sup>[3]</sup>按照何天爵(Holcombe Chester)的《真正的中国佬》一书的提法,叶钟济基本上可以认为已近于何天爵所说的 literati。何天爵将中国的“乡绅士大夫阶层”译为 literati(意即“文人”、“知识界”),认为“这一阶层的人都是在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受过教育的读书人”<sup>[4]</sup>。“何氏凭感觉认识对中国‘乡绅士大夫’所下的定义虽不全面,但却抓住了‘乡绅士大夫’的最本质特征——即知识占有者。‘士绅’正是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知识阶层,在明清两代充当着社会权威、文化规范的角色,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5]</sup>也就是说,叶钟济至少符合了清末已经在起变化的“士绅”阶层的必要条件,即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叶钟济的职业也显示出“通过对知识的占有以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的特征。同时,叶钟济的文化认同与日常生活,也体现出了作为一个知识阶层“对于传统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功能。按叶圣陶的回忆,叶钟济极具孝道观念。每逢“鬼节”和年夜的“人节”,叶钟济都要循旧俗祭礼<sup>[6]</sup>，“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

[1]《休宁县志》卷七《汪伟奏疏》,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页。

[2][3][6]商金林撰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3页,第3页。

[4]何天爵:《真正的中国佬》,鞠方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页。

[5]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sup>[1]</sup>而对待普通平民,叶钟济则显示出对“仁”的坚守。叶钟济常去小铺子买东西,有心让他们赚钱。别人嫌小铺子货物差时,他却说:“我们不去买,小店的人靠什么生活呢?”<sup>[2]</sup>叶钟济所持的“孝”、“仁”,正是传统文化与伦理观念的核心。而且叶钟济对孝与仁的守持,是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行为,决不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反应。关于士绅阶层的文化属性,已经有很多学者进行了认定与界说。比如萧公权把“绅士”称为“有官职或学衔的人”<sup>[3]</sup>。余英时、张鹏圆等学者则较为强调绅士阶层的知识分子内涵,认为他们虽不一定等同于知识分子,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社会来源<sup>[4]</sup>。无论何种定义,其中最核心的还是文化的占有和知识的掌握。由此可见,从文化的分层来说,叶钟济则应可以认定为苏州士绅阶层中人。

特别是叶钟济家迁居悬桥巷生活,更加强了叶氏的文化认同。悬桥巷这个在苏州老城中并不起眼的小巷子,却曾经汇集着几多名门大户,折射着近代苏州文化辉煌的侧影。明代高士徐波居住于此,复社成员郑敷教宅桐庵亦在此巷内。1802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迁居这里,从此巷中有了中国文化史上极著名的“百宋一廛”藏书楼。1831年朱绶世曾居此巷。悬桥巷里也有洪钧的宅第、宗祠。顾颉刚出生的顾氏祖业顾家花园,亦是巷中著名的清代早期建筑。顾颉刚曾回忆说:“巷有闻人三,明之郑桐庵,清之黄尧圃、洪文卿。《孽海花》既隐洪文卿为金雯青,亦隐县桥为圆峤巷。尧圃之家今为潘氏家祠。”<sup>[5]</sup>巷内多有名贤祠堂。如丁氏二贤祠、丁参议祠、陈五经公祠、张公祠,还有祀清户部主事潘世璜的潘公祠。在潘姓祠堂的后园一角的人家,即叶钟济家。

叶家最初所处的城西南盘门是交通发达商业贸易繁荣的热闹处,而悬桥巷则有着深厚的斯文传统,表征着精致高雅的中国文化在江南的积淀,可谓郁郁乎文。文化一词由“文”与“化”两个字组成,“文”是斯文,而“化”则是化育、涵养之意。作为账房先生的叶钟济,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所在,浸润熏陶,斯文自然而生。因为文化的熏习、浸染,敬文书的意识在无形中得到滋养生长。于是,叶氏这户商贾人家,从明末清初迁徙到苏州,到清季移居深蕴文化气息的悬桥小巷,终于落根于更为适宜的斯文土壤。一颗文化的种子,即将破土而出。而这颗文化的种子,即日后成为现代著名作家的叶绍钧。

### 三

叶绍钧出生于1894年,自小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到1900年进私塾,已经识字三千左右,字也写得清秀”<sup>[6]</sup>。私塾读书之后,父亲叶钟济要求更严。叶圣陶1914年3月6日日记曾回忆:“幼时在塾中读书,……《诗》、《易》两种,最受其苦。大人于夜中督之,曾以弗熟而不得进膳。”<sup>[7]</sup>顾颉刚曾称叶圣陶是“一个富于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sup>[8]</sup>。少年叶圣陶即显出如此才华,毫无疑问与家庭环境的教育熏陶关系莫大。如前所述,叶钟济本人是在当地受到尊敬的知数,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在这个家族中有着多位知书明理的知识占有者。其家族亲戚也多有读书人,比如叶绍钧的叔父叶朝缙,字绶卿是教书先生,叶绍钧的表兄孙伯南学识渊博,后任苏州草桥中学国文教师。可见,叶圣陶出身

[1]叶圣陶:《过节》,《未厌居习作》,[上海]开明书店1935年版。

[2][7]参见商金林撰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10页。

[3]Hsiao Kung-chuan, *Rural China: 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Un. of Washington, 1960, p.316.

[4]参见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5]顾颉刚:《记三十年前与圣陶交谊》,[重庆]《新民报》1945年1月1日。

[6]商金林:《叶圣陶年谱长编》第一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序》,《古史辨(第一册)》,北京朴社1926年版。

于有一定底蕴和自觉意识的基层文化精英家族。

在清末民初,作为基层文化精英的中小学教员,成为地方民间社会新阶层的一部分,正逐渐地代替封建传统社会的“士绅”。传统士绅阶层的衰落和新文化阶层的形成,与教育制度的革命性变化有关。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sup>[1]</sup>。科举制度的废除,“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sup>[2]</sup>。教育体系的根本性变化,使得原有的选官入学制度被抛弃,依附于科举制度的传统士绅阶层自然没有了生长机制,必然会衰落和最终消失。代之而来的,则是发挥着类似功能的新的文化阶层。这一新知识阶层的来源,相当部分在于接受新式教育的师生群体。有学者已经注意到:“科举的废除切断了旧式功名士人向上的入仕之径,但晚清政府又设计了另一条终南捷径,那就是新式学堂。……而掌控地方的新式精英们也是从这条途径中遴选出来的。”<sup>[3]</sup>是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阶段,随着前清旧派和科举功名者的减少,“士绅”一词的指向也正在变化:“在明清时期的话语系统中有‘士绅’一语,指乡居的离职官僚和科举士人”,至民国时期,新的“士绅”更多地“被用来指称各种在地方社会有声望、有地位的人士,其中既包括传统的士绅,也包括民国党政军新贵、新式商人和新文化人。显然,这一社会群体较之严格意义上的明清时期士绅阶层要宽泛”<sup>[4]</sup>。也就说,与传统社会相比,新的“士绅”概念所指范围有所变化,这其中就包括受学堂教育出身和任职于各类新式学校的新文化人。

传统士绅阶层衰落,士绅意涵发生新变,新的文化阶层开始形成,这在民国时期地方基层公务人员选拔制度设立上也可可见一斑。比如1929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区自治施行法》规定的区长和区监察委员的任职资格<sup>[5]</sup>及1929年9月国民政府公布的《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的正、副乡镇长及乡镇监察委员会委员的任职资格<sup>[6]</sup>,其中均包括“曾任小学以上教职员或在中学以上毕业”这一条。这表明,中小学教员在民国时期作为民间和官方之间的知识者,具有了新的知识权力,随时可以转变为政治体系中新的当权者。比如有学者曾对1913年直隶省获鹿县入选县政府各科室人员的知识背景和履历进行了考察。其中相当部分的参试人员有中小学堂任教的经历<sup>[7]</sup>。无怪乎有学者说,“从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旧的士绅阶层随科举制废除和清王朝灭亡而趋于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与地方自治制度相为里表的新官绅阶层。”<sup>[8]</sup>这些充任中小学教员、校长的新的基层文化精英人士,在民国新的体制设计中,完全具备了进入政治架构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基层社会的新式文化精英,中小学教员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类似于封建社会中在民间掌握相当话语权力的传统士绅阶层。“新学培养出来的新式精英群体已经渐成气候,开始接过传统士绅的接力棒。”<sup>[9]</sup>

作为废除科举之后的第一代读书人,叶绍钧就成为了新式学堂教育培养出来的文化人。1906年叶绍钧与顾颉刚、章元善等一同考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后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即所谓草桥中学。叶圣陶1911年中学毕业,第二年担任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1914年短暂任教于苏州农校,1915年到上海尚公小学任教,后又转任用直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教员。此后,叶圣陶又至中国公

[1]《清帝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史教育史资料》(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

[2]严复:《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严复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3][7][9]任吉东:《近代地方精英群体的养成机制初探——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长春〕《史学集刊》2012年第2期。

[4]魏光奇:《国民政府时期新地方精英阶层的形成》,〔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5]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85号)》,〔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6]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72号)》,〔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版。

[8]魏光奇:《直隶地方自治中的新官绅阶层》,《首都师范大学史学研究》第一辑,〔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学中学部、浙江一师等任教。1922年至1923年叶圣陶曾有短暂的北大预科讲师以及上海神州女校、福州协和大学等执教的经历,直至任职商务印书馆为止。也就是说,1912年到1923年这十余年间,叶圣陶辗转于多个中小学任教。就其身份而言,叶圣陶典型地属于受新式学堂教育出身和任职于新式学校的新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新的文化阶层中的一员,他符合民国初年发生新变的士绅阶层的特点。

#### 四

我们知道,在传统中国社会,士绅阶层或者文化精英、文化家族的出现,都与政治权力有关。而近代媒体的出现和现代化发展,是文化转型和革命的成果,更是助推器。当传统的科举功名此路不通时,给读书人可供选择的路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报章媒体成了吸纳和汇聚具有才华和热情的青年人的重要平台。近现代传媒则完全打破了传统阶层的封闭的现象,知识者能够通过杂志、报章,将自己的诉求、言论、思想传达出来,在普通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从而造成文化传媒偶像的出现。媒体不仅仅是读书人晋身扬名的通道,更是斯文汇聚、文化精英生长的极为重要的平台。

如前所述,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民国上半期,中小学教员依然是各级地方政府职位的重要来源,也就是说中小学教员是“新士绅”阶层的组成之一。按照当时的情况,叶圣陶是有机会到地方基层政府任职,成为官僚中的一员。但叶圣陶中学毕业以后,袁希洛“不赞成到‘政府’部门任职,建议当小学教师”,这也符合叶圣陶的志趣,于是他听从袁希洛建议,开始长达十余年的从教经历。1923年离开了中小学教坛的叶圣陶,最终又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即出版行业。

由新式学堂到现代书局,叶圣陶实现了从民国新士绅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叶圣陶通过《新青年》、《新潮》、《诗》、《中学生》等杂志以及商务印书馆、开明书局等,由一位中小学教员,逐渐成为一代文化名人和知识分子。在叶圣陶的文化身份转变,乃至叶氏文学世家形成的过程中,现代传媒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以“五四”时期为例。虽然不像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等人在著名学府求学,但远在江南的叶圣陶的心情却与时代脉搏一起激荡着。1915年11月25日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青年叶圣陶的焦灼心情:“夜览《青年杂志》,其文字类能激起青年自励心。我亦青年,乃同衰朽。我省之目的为何事?精神之安慰为何物?胥梦焉莫能自明。康德曰:‘含生秉性一人皆有一己所向往’。我诵此言,感慨系之矣。”<sup>[1]</sup>1917年,胡适之、陈独秀等高呼文学革命,进而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而就在这期间,叶圣陶与吴宾若、王伯祥等有进步倾向的教员一起进行教育改革。顾颉刚曾说:“他(叶圣陶)在这几年里,胸中充满希望,常常很快乐的告诉我他们学校里的改革情形。他们学校里,立农场,开商店,造戏台,设备博览馆,有几课不用书本,用语体文教授……几年内一步步的做去,到如今都成功了。这固是圣陶的一堂同事都有革新的倾向,所以进步如此其快,但圣陶是想象最锐敏的,他常常拿新的意见来提倡讨论,使全校感受他的影响。”<sup>[2]</sup>1919年北方一帮大学生创办《新潮》杂志,远在江南的叶圣陶不断投稿,在这个杂志上鼓呼。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发生,而就在第二天,叶圣陶在用直召集学生开会,宣讲前一天北京的那场集会。1921年,中国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叶圣陶参与发起。第二年1月,在南方上海,叶圣陶与朱自清、俞平伯、刘延陵创办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专门刊载新诗的刊物——《诗》月刊。以及后来的主编小说月报、参与创立开明书店等等文化举措,无不显示叶圣陶在新的传媒社会的助推下,早已超越了民初时期“新士绅文化阶层”,在现代知识分子的

[1]顾颉刚:《〈隔膜〉序》,叶绍钧著《隔膜》,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路上搏击。

## 五

叶氏文学世家和知识阶层的变迁,表征着百余年中国别一种现代文学谱系的延续。纵观叶氏文学世家,几代人体现出一种延绵相继的文学风格。而这文学风格相继和文化谱系延续的背后,折射的是文风、门风、世风、士风的变迁与承传。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的语言抒情倾向非常严重。很多人误认为只有抒情才能有“诗意”,这样的文字才是文学。抒情主义的这种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与曾经的颂歌时代有关。1949年以后的三十年间,曾是一个颂歌时代,诗歌是政治抒情诗,而散文也几乎变成了政治抒情文,甚至很多小说充斥着某种狂热的讴歌。在这种时代文风的大背景下,我们考察叶氏三代的写作,就会发现从叶圣陶到叶至善、叶至诚,再到叶兆言,他们的文风有着先后相继的一贯特点,即语言平实明白,一清如水,情感讲究节制。

这种特点的形成,首先可从叶圣陶对语言风格的追求找到源头。叶圣陶说:“文艺必须语言文字顺适畅达,一篇成个整体,每一句话成一句话,才算得比较象样。”<sup>[1]</sup>叶圣陶还强调:“语言要求节约跟思维要求节约是分不开的。在思维过程中,必须把那些罗罗嗦嗦的不必要的东西去掉,同时非把那些必要的东西抓住不可,这是思维的节约。表现在语言方面,就是语言的节约。”<sup>[2]</sup>正是因为叶圣陶文章语言的特点及其对这种平实畅达风格的坚持,直接影响了叶至善、叶至诚对语言风格的认知。欧阳文彬的一则记述,即是证明。抗战胜利后,叶至诚曾和欧阳文彬一起合译《黑玫瑰》。欧阳文彬说:“他(叶至诚)比较崇尚朴实,容不得半点欧化的语法;我认为译外国作品和创作不一样,人物对话可以带点洋味儿,还有点追求词藻。有时为了一句译文,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吵得不欢而散。回想起来,他当时在文风上已有自己的追求:朴实无华,琅琅上口。”<sup>[3]</sup>朴实无华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叶兆言的文风。尤其是在散文中,叶兆言的朴素、平实底色是一贯的。在1950年代出生的当代作家中,若论语言、文风,叶兆言的风格显得另类。叶兆言行文语言朴实,情感节制,不喜者认为有寡淡之嫌,但统观其创作,就会发现这其实是其一贯的追求。这种质朴的语言风格,在民国时期,恰恰是文章的主流。就文风与语言而论,如果说现当代文学有所谓鲁迅传统、知堂传统,以及胡适传统<sup>[4]</sup>的话,叶氏三代的文风,更接近于胡适之风:清楚明白,一清如水,朴实无华。

在整个时代的抒情风习一统天下的时候,一个家庭、家族作为小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拒斥时代的风气。叶氏三代文风的一贯,亦可作如是观。叶氏文风的形成,从根本上说又与叶氏的家风、门风有很大关系。“何谓家风?一般说来,家风就是世族精神文化传统。一种精神或行为方式在某一家族内延续三代以上,便可视为某一家族之文化传统,构成其家风。家风是世族文化的基调和底色,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世代相承。”<sup>[5]</sup>一个世家的门风,体现的是一种文化涵育,彰显出一种文化姿态。陈寅恪曾经论及门风时说:“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sup>[6]</sup>一般人们评价家族、门第,往往

[1]叶圣陶:《一篇象样的作品》,《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2]叶圣陶:《关于使用语言》,《叶圣陶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

[3]欧阳文彬:《他这一辈子——忆叶至诚》,《欧阳文彬文集》(散文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94页。

[4]参见刘绪源:《今文渊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5]王永平:《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

[6]陈寅恪:《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60页。

容易从政治权势、经济凭借的角度来看,事实上,除了这两个外在的条件外,文化世家的形成更在于门第中人的文化滋养和精神气质的传承。

门风的传承体现的是文化的缓慢而长久的力量。文化的“化”,已说明了这种方式是“化育”、涵养,“化”的必然是人心,改变的是内在的心灵、深层的思想意识,从而实现“人”的确立。“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终根源;是人的最优发展,而不是生产的最大化,成为所有计划的标准。”<sup>[1]</sup>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门风、家风,其实就是运用文化的力量、涵养的方式实现对人的培养确立。立人,立的是人的内在灵魂,而非外在的物质躯壳,即人的理念开明、心智健全、个性独立。

门风、家风的形成赖于家庭氛围的影响和熏习,在于长辈对后辈子弟的有意识的言传身教。言传身教,古今一也。重视文化培养和德性涵育,历来是中国传统家庭极为注重的。类似地,叶圣陶对于自己孩子的德性之养成,非常重视。叶圣陶的三个孩子分别名为至善、至美、至诚,由此可见作为父亲的叶圣陶对自己下一代的道德期许。起名一事虽小,却体现父母对下一代人的期望,这对于后代的自我认知,对于家风的形成,家族内在气质的延续,无疑有着规约影响作用。在百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像叶氏家族这样,一家三代都从事文学工作的,还确乎罕有,这不能不说与叶氏几代人一贯重视文学传统有密切关系。叶圣陶非常重视自己孩子的为文与为人,故有《花萼》、《三叶》集的出版。叶至善也继承了这种培养方式。到了叶兆言,对其女儿叶子用心颇细,曾出版他与叶子的合集。这说明叶氏家族形成重视文学修养的保护和激发的自觉。

除了有意识的身教、言教外,无意识的文化濡染熏陶,也会强化世家中人的情感认同。比如叶圣陶与顾颉刚、俞平伯等故交的往还,叶至诚等与当代作家友人的交往,这些都会形成一种整体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后辈的文化认同倾向、精神气质,乃至写作选择。比如叶兆言散文写作的题材、风格与趣味,与其祖、父两代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很有关系。在叶兆言的散文创作中,除了描摹和关注旧都金陵的风物外,更突出与集中的则是对近现代以来的文士硕儒等“陈年旧事”、“陈旧人物”的追慕<sup>[2]</sup>。民国文人风范、士林品格是叶兆言散文津津乐道的话题。叶兆言曾在多个杂志开设相关专栏,发表民国文人系列散文。叶兆言的小说历来最为研究者注意,但是笔者以为,其散文写作或许更耐人寻味。与同辈的作家相比,叶兆言这种对近世耆宿文士的癖好和趣味,毫无疑问与叶氏家族历史的影响和熏染有关。叶兆言着意于现代知识分子的陈年往事,追怀民国历史的风云激荡,是对叶氏家风的重识与认同,是在向曾经逝去的文化阶层和文化风范致意。

总之,百余年来叶氏文学世家的发端和进程乃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在五四以来变迁过程中的某种侧面,既意味着传统文化基因的滋养,更表征着新的文化质素的成长,也蕴含着社会文化结构的调整。本文探寻叶氏文学世家形成的文化根源,考察叶氏文学世家变迁中的斯文流动过程,可窥见近代以来中国百年世风与文风的递嬗,这其中也折射出了士绅文化的现代转型和现代社会文化分层的新变。

[责任编辑:平 啸]

[1]E. Fr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96.

[2]参叶兆言:《杂花生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陈旧人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陈年旧事》,〔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等。